



上海书画出版社
Shanghai Painting & Calligraphy Art Publisher

张宗祥 顾鼎梅 著
祝 帅 导读

书学源流论
书法源流论

张宗祥 顾鼎梅 著



经典
学术

书学源流论 书法源流论

祝 帅 导读

上海书画出版社
Shanghai Fine Arts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学源流论 / 张宗祥著；祝帅导读 . 书法源流论 /

顾鼎梅著；祝帅导读 . —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8.11

(朵云文库·学术经典)

ISBN 978-7-5479-1924-8

I . ①书… ②书… II . ①张… ②顾… ③祝…

III . ①汉字—书法史—中国 IV . ① 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8511 号

书 学 源 流 论 书 法 源 流 论

张宗祥 顾鼎梅 著 祝帅 导读

责任编辑 王晓光

审 读 曹瑞锋

责任校对 朱 慧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顾 杰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o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163.com
制 版 上海世纪嘉晋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8.75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9-1924-8

定 价 45.00 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朵云文库·学术经典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池瑜 陈振濂 邓福星 范景中 郎绍君 卢辅圣
潘公凯 潘耀昌 薛永年 尹吉男 周积寅

编辑工作组

王立翔 王剑 曹瑞锋 陈家红 朱艳萍



张宗祥（1882—1965），学者、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曾任西泠印社社长、浙江图书馆馆长等职，其研究与著述范围甚广，尤擅金石和碑版之学，有专著《书学源流论》《张宗祥藏印选》《张宗祥印选》《论书绝句》《临池一得》等行于世，其校勘的古籍有300多种，如《说郛》《国榷》《罪惟录》《越绝书》等。

顾鼎梅（1875—1949），致力于金石碑版、书籍收藏与目录学研究，善书画，曾经营上海科学仪器馆，任上海美专兼职教授。《书法源流论》是其书学研究的代表作，该书民国版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书法史体例的专著。本书中的《书法源流论》为该著1949年后首次出版。

丛书弁言

王立翔

中国艺术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然以书画为核心的中国艺术本体认知及其理论阐发，近代以前，学人多以诗赋、笔记、题跋为载体，以描述、感悟为表征。这与主流阶层，将艺术仅作为从政之余抒发心志之观念有关，这导致了书论画学诸门无法望经世之学项背的事实。但近世以后，尤其是辛亥以来，随着传统士阶层社会作用的变换，以及治学语境、研究视野、学术方法之更改，在一批卓有才华的新学人努力下，传统艺术进入现代学科视域，中国艺术的本体精要和文化精神开始得到了全新的诠释、辨析和发扬。毫无疑问，因与西学的碰撞和融合，中国传统学术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长期学究中，向以画学一门最为突出，其学术语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的中国文物和书画名迹流至域外，引发了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他们运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开始阐述各自心目中的中国美术，对国人产生了不小影响。当然最为重要一页的翻起，仍是游学海外的中国学人自己，他们张开胸怀，吸收着西方工业文明下的现代科学理念和治学方法，开始了勇于辨讹、尝试思辨的别开生面的中国画史探索。

在国内，敦煌藏经洞、各地石窟墓室的先后开启，一次次突破着人们故往的认识；动荡的社会，导致文物大量流失，也使更多的新材料能为研究者所用。而在现代印刷技术的传播下，美术材料的易见

性大大冲破了原有的局限。作为近现代学术成立的两大基石：新材料与新方法，一时蜂拥展现在 20 世纪初的艺术学人面前。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下，一批学者放眼世界，既吮吸西方新学，又融合中国传统学养，投入到以书画为主体的中国艺术研究中。纵观这一百年来，他们经历了模仿到兼通到后期体系自建的历程，现代学科应具备的特质如理论性、逻辑性、体系性等逐步成熟，呈现出一条上承古代下启当今的鲜活的学术生命之流。他们关注新材料，寻觅新方法，创建新思想，以筚路蓝缕的拓荒精神，开启出中国艺术研究从未有之新境。

今之视昔，此间研究均有时代局限，但许多著述仍因有奠基之功而成为后学之经典。为使当今学界和继学者更方便更完整地获见此一时期的中国艺术研究成果，我们精心遴选一批近现代艺术文献再予整理出版。所取著作肇始于 20 世纪初，迄于“文革”之前；所选范围，乃以中国传统艺术为主体，兼及诸种工艺美术；所选标准，则以于当时有重要作用、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之论著为重。我们注重文本的准确性，同时从艺术研究对象出发，分别配以图版，以作印证。尤为重要的是，我们邀约专家撰文导读，以帮助读者理清原著学术脉络，辨明文中精义，认识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展现前辈们的学术个性，便初学者获得治学门径。以上努力，或谓于具体问题之分析仍有巨大学术价值，或谓对推进当今之中国艺术的深入研究亦有重要启思意义。因以“朵云文库·学术经典”系列贮存，以钩沉论艺渊薮，绵延传统文脉，尽责无旁贷之职！

目 录

丛书弁言 王立翔 001

**导读：“源流论”与“书学史”：对民国书法史著述体例的
一种考察** 祝 帅 001

书学源流论 张宗祥 031

书法源流论 顾鼎梅 089

附录 117

书法源流 方旦若 119

书学源流考略 吕 咸 128

图版目录 130

导读：“源流论”与“书学史”： 对民国书法史著述体例的一种考察

祝 帅

有关“中国书法史”作为一种现代学术体例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生成问题，近年来已经有诸多研究。学术界公认，民国时期的书法史研究曾一度形成学术热潮。除了众所周知的沙孟海的成名作《近三百年来的书学》和祝嘉体例完备的《书学史》之外，张宗祥的《书学源流论》和原载于沈子善主编、中国书学研究会出版的《书学》杂志的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也已令书法界耳熟能详。除此之外，笔者还曾在南京图书馆钩稽出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书法史著作、王峻（岑伯）1919 年出版的《书学史》，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史学论丛》中发现孙以悌的《书法小史》，从沪江大学《天籁》杂志中检索到王治心的《中国书法史述略》，从云南省图书馆查到顾鼎梅的《书法源流论》成书等。这些著作或已经具备现代学术的雏形，或处于从传统的书论向现代学术著作的转型过程之中，其体例和方法都对书法史学史、特别是书法史的生成学有典型的意义。^①尽管多种民国旧期刊全文检索数据库的建立和应用让我们对民国时期书法史研究的文献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论及著作体例之完备、述史之自觉，还

① 参见祝帅《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历史生成——以王岑伯、沙孟海、孙以悌、胡小石、祝嘉为中心》，《中国美术馆》，2010 年第 5 期。

是以上述几部作品最为完整和典型。

在诸多的民国书法史著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整个民国时期书法史研究成果的命名大多称为“书法（书学）史”，但还有一类文献（以张宗祥和顾鼎梅的两部著作为代表）则称为“源流论”，这种对史学著作的命名方式在当今的学术界中几乎是很难见到的。并且，民国书学研究领域中同时出现了两部以上以“源流”为题名的著述，这显然不是偶然现象。简单地以著作诞生的时间先后来解释“源流论”与“书学史”两种著述体例之间的关系显然与事实不符。那么，在现代中国书法学术史特别是史学史上，“源流论”与“书学史”二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作为现代学术体例的“源流论”与“书学史”两种不同的书法史写作范式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张力？为解开这些问题，需要来解析张宗祥和顾鼎梅两部题为《源流论》的书法史著作的文本与思想。

一、张宗祥《书学源流论》：承先启后的过渡之作

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号冷僧，斋号铁如意馆）既是现代中国书法史的开拓者，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不应该被忽视的人物。作为海宁人，张宗祥虽与王国维、蒋百里等乡贤交善，但由于为人处事的低调，使得他的知名度与其他几位不可同日而语，也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极其不相称。在书法上，张宗祥曾在1963年担任西泠印社的社长一职。其书法出入碑帖之间，自成风貌，在江浙一带也一度多有师法者。在学术上，出生于书香世家、作为前清举人的张宗祥虽曾历任多种学堂教习，但他恰恰未曾经历过新式高等教育，也未在后来的大学中担任教职。不过，家学渊源和长年的图书馆工作经历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旧学修养，日后主事浙江省教育厅的工作也为他塑造了广阔的学术眼光。不同于现代西方学术的专业分工，受传统学术方式的影响，张宗祥的著述遍布文学、史学、戏曲、

中医、书画等多个领域，但所作大多为短篇。在其书法著述中，除早年的代表作《书学源流论》外，尚有未定稿的百余首《论书绝句》、书论《临池一得》及一些论书函传世，散见于民国时期的《书学》及其他多种报刊。

这里所讨论的，是正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冲击到书法界之时，时年 36 岁的张宗祥推出的首部书法著作《书学源流论》。据线装本所收作者自序，《书学源流论》实际为戊午年（1918）撰写，辛酉年（1921）以铅活字版、线装的形式在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出版。^①在正式成书之前，《书学源流论》还曾以连载的方式，分 42 次在《新华日报》第五版上刊出，自 1920 年 7 月 1 日刊出第一期始，10 月 30 日止。

在《书学源流论》戊午序中，作者这样自陈写作缘起：“戊午夏，百里（蒋百里——引者注）来寓，语予云：‘近著一书，论书学于美术上之位置。’予因亦掉笔弄毫，以成此篇。百里之书予未见，予书成而百里又东渡。”关于此书的成书，在后来的《蒋方震小传》（1960，收入《铁如意馆碎录》）和《冷僧自编年谱》（1964）中，张宗祥又曾两次提及，内容大致相同：“1918 年，百里进中将，数年之间皆寓居北京。一日语予曰：我将著一书论中国书学，上卷为中国书学在世界美术上之位置，我自任之；下卷为中国书学源流，尔为我写之。我曰可。一旬后，我书成，彼乃未着一字，我书遂独立付印。”^②“（1918 年）百里时究美术，一日，语予曰：将著一书，上卷论中国书法载美术上之位置，自任之。下卷论中国书法源流。下卷，知者太少，子任之。予遂以案牍之暇，随笔写三四日，成《书法源流论》一卷，百里上卷终未

① 以下引该著文字皆引自此书，不另行出注。另全文收入《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年版。按，该论文选收入此书时，称原书为 1919 年聚珍出版，恐有误。

② 张宗祥《蒋方震小传》，载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铁如意馆碎录·铁如意馆读书札记（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20 页。

作。”^①不管写作时间是“一旬”还是“三四日”，都看得出，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部在短时间内信手拈来的计划外的著作。

案，蒋百里的书学著述不但当时为张宗祥所未见，就是此后的论著中也未见钩稽，故可知该书始终未定稿成书，“论书学于美术上之位置”实非书名，而只是一个未完成甚至未启动的研究计划。故张宗祥在辛酉序中颇有些自得：“艺术之书，传者绝少，譬诸久行沙漠中，一旦得见草木，虽寻常，或亦足赏玩耳。”^②不过，或许与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此后整体并入上海中华书局有关，此书当时发行量相当有限，以至于作者在40年代曾两次复函《书学》杂志主编沈子善，称：“拙著《书学源流论》，寓中已无此稿，不知浙馆尚有是书否。尚有《论书绝句》百余首……未写定稿，在行箧中不知藏于何处。”“《源流论》早无剩书，《论书绝句》诚如来书所云，未能觅得。”^③看得出多年之后的40年代，还是时常有人提起这部张宗祥早年的著作。直到1964年自编年谱时，张宗祥还这样不无自得地说：“予稿寄上海，予弟示诸友，诸友怂恿付印，书乃流传。今印本早尽，稿亦遗亡矣！”^④

如果说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中国现代书法学术史的逻辑起点的话，^⑤那么，说张宗祥的《书学源流论》是中国现代书法史学史的滥觞，无论是就其写作时间还是其学术影响力而言，大概都不会有什么疑义。在从传统的“书评”到现代的“史学”运动的过程中，张宗祥的《书学源流论》扮演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承上启下的历史角色。况且，张宗祥的这篇论文全文收录于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93年编

① 张宗祥《冷僧自编年谱》，载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铁如意馆诗抄·附冷僧自编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

② 张宗祥《序》，载氏著《书学源流论》，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1年铅活字印，第1—2页。

③ 张宗祥《与沈子善论书函》，《书学》，1943年第1期。

④ 张宗祥《冷僧自编年谱》，载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铁如意馆诗抄·附冷僧自编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

⑤ 参见祝帅《康有为：现代书法学术史的逻辑起点》，《书法导报》，2010年12月3日、7日连载。

辑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这部发行量和影响都很大的著作；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此书与《清代文学概述》合编的单行本，列为该社出版的《张宗祥文集》之一种。只是这些选本都没有收录该书初版时的作者序言，且偶见舛误。（据出版说明，《张宗祥文集》所收版本系根据浙江图书馆藏作者手稿整理而成，故与聚珍版的文字差别或与此有关）但至少近二三十年来，书法理论界对于这篇文献并不陌生，在期刊、会议和学位论文中，也出现了大量出版、解读、研究《书学源流论》的著述。

《书学源流论》是一部成体系的书法史作品，系从“源”和“流”的角度，入手讨论历代书法的流变，分为原始篇、物异篇、时异篇、势异篇、人异篇、溯源篇、篆隶篇（附章草）七篇以及附录鉴赏篇。从基本结构来看，这种体例设计并不符合现代西式学术方法所遵循的“形式逻辑”，也并不见于古代的书论著述之中。张宗祥的研究框架虽然不能说是全新的，但至少是一种综合了古典与现代学术之特色的创举。这七篇之中，既有与古代的书法论文一脉相承的内容，尤其是物异篇（论书写工具）、势异篇（论用笔之法）、人异篇（论胸襟与学问）各篇，这从作者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如“势”）等就可以看得出来；也有与新式“书法史”体例不谋而和的章节，如以专题论述书体演变的原始篇和紧扣书名之主体的溯源篇。尤其是时异篇，这是一篇纵论从汉晋至清季的书法通史，其跨度之大几为此前所未见。

与一般的“史”相比，“源流论”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更加鲜明的“史观”色彩。所谓“源流论”，就是把历史发展的初期，即该书所指的古代书法看作“源”，而把历史发展的后期，对该书而言就是唐代以后的书法看作“流”。这样，不同于一些盲目的历史大事记的罗列，作者的观点显然是承认历史发展有前后因循的规律性可言。作者的历史观鲜明地体现在各篇的叙述之中，书名《书学源流论》即显现出一种叙述书法史变迁的决心。尽管清乾隆年间即有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但在中国古代书论中，尚无把书法和“源流论”这种文体结

合在一起的先例。在该书的时异篇中，作者张宗祥这样叙述自己所说的“源”和“流”之间的关系：

予之略举汉、晋至清诸家之书也，盖欲使人略知其源而深明流之不同也。夫流之不同非后人不善学前人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也；书家忌匠手，虽学前人必存自己面目，二也。而最大之处则为时代，所谓时代者，风尚习惯是已。

其实，从中国传统学术的“目录学”方法开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便成了后世学术史研究追摹的目标。但承认了学术有“源”与“流”之分，就等于假设了不同的学派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共同的源头。《庄子》杂篇中的《天下》，常被论者视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篇文献。在《庄子》看来，“道术”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只是因为“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而使得“百家往而不反”；“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①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源头”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它需要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进行回溯性的梳理与建构。这里的“一”，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的逻辑起点。我们没有理由像《庄子》那样要求所有的“流”都回归“源”才能达到学术上的正统，但是明确书法史上的“源”与“流”，有利于完成一种现代目录学式“正本清源”的梳理，而这正是张著所高悬的一个学术目标。

在作者看来，从“源”到“流”，书法史的发展像一条长河，从未中断。即便从表面上看缺乏连续性，作者也对其源进行了主观的追溯。这种观念承认了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线索和规律，这在该书的时异、溯源各篇中都有清晰的体现。如在溯源篇中，作者使用表格的形式，来追溯有清一代书家的师法渊源。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当时流行的

^① 《庄子·天下篇》，《庄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599页。

“碑学”“帖学”二分法不同,张宗祥提出了以王羲之和笔法传承谱系为源流的“王氏之学最纯粹者”,师法《张黑女》、汉隶及唐人的王系“间道/旁流”以及取法六朝造像、《张猛龙》等“王系之外”的三分法。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以何绍基、翁方纲等人为代表的“间道/旁流”,虽然“溯河而上,止于中流”,但“究其指归,亦王系也”。这种打破了碑学/帖学这组二元对立范畴的书法史叙述,避免了给风格各异的书家简单地贴上碑学或帖学标签之嫌,对书法史现象做出了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

不过,仅仅从书名上还看不出作者的褒贬。如果把“源”和“流”过度地解读为一种价值判断的话,那么应该说就是误读了作者的本意。作者的观念是,“源”与“流”不同,但正因为这种不同,书法史才有发展的可能性。作者并没有因为源而贬低流,相反,他肯定了书法史的传承既是由继承“源”而来,也不断地加入每个时代不同的时代风格,即所谓个性。虽然作为流的书家和作品的风貌与其源头很可能大相迥异,但这并不妨碍品鉴、欣赏和批评。相反,不同的时代,各有各自的好作品和差作品,如作者所说:“世之论者但当分别其工拙而已,不能执时代以断其优劣也。”可以说,张宗祥的观点虽与书法创作领域强调的“学源不学流”并不相同,却反映出史家之不同于实践家的客观与审慎。不管是对“源”的解读,还是对“流”的分析中,作者的史观和面对不同时代作品所采用的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也贯穿其中。细绎之下,不难发现作者的书法史研究方法,有这样几重鲜明的特色:

首先,“史实”与“史观”相辅相成,既有平实的叙述,也有褒贬鲜明的议论。例如,在谈论书法史上的“唐宋之变”这次关键“革命”的时候,作者既指出宋人对于唐人的因循(“宋之兴也,书皆宗唐”),也看到了宋人对唐代的因循是有很大局限性和选择性的(“弊在专精尺牍而不工碑版……使作真书碑版,乃如乡老等庙堂与嘉宾相周旋,手足不知所措”)。这也与张宗祥在《与吴敬生兄论书》一诗中对

宋人的批评如出一辙：“我欲师晋人，晋帖勾摹神已损，我欲师宋人，宋贤规范去晋远……东坡居士能书碑，执笔过低亦憾事，墨肥肉重非我师。”^①张宗祥并没有像祝嘉那样明确断言宋代取法帖而非碑是由于战乱破坏与刻帖兴起所致，并且其观点难免“或有时而可商”，但对书法史上唐宋之变的描述可谓立论鲜明，显然这种自觉的“史观”意识和叙述方式正是现代新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史实”而论，限于时代和眼界等技术原因，张宗祥对书法史资料的掌握并不可能比后世的书法史学者更多，但就对所提及作品的评述的“史观”而言，显然张宗祥比起祝嘉等后辈来可谓丝毫不逊色。毕竟书法史的研究，要求在“书评”之外，加入很多理论的分析与解释，体现研究者对于现象发生背后问题之思考的“史观”。

其次，“通史”与“专题”相得益彰，既有时异、物异、势异、人异这样的分期叙述，也有原始、溯源、篆隶、鉴赏这样的专题研究。虽然“时异篇”还是按照朝代做了分期的处理，但作者在叙述每一朝代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看到前后因循的历史联系。并且，无论是在通史还是专题部分，全书在历史意识方面都极其自觉。与以往的“书评”或者“法书苑”不同的是，张氏的《书学源流论》不像过去的著述那样简单地以“朝代”或者“人名”为经——那样的著作还仅仅是一种不自觉的“书评”而不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史”。与一般的书法批评、书法评点不同，《书学源流论》的特点，还在于从字体、物异、时异诸方面入手结构全篇，从中能够见出作者对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的理论解释和把握，而不只是就事论事。其中很多论点，不乏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判断和把握，也给后人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与空间。这种专题式的写作方式是按照朝代编年体书法史的一种重要补充，显然也更加类似于当代西方学术中的史学理论和问题意识，而与古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一类的点评体的文风拉开了距离。

^① 张宗祥《与吴敬生兄论书》，《书学》，1943年第1期。